

# 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sup>\*</sup>

裴盛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024)

**摘要** 在现代人类社会对地球各种生命形式的巨大影响下,生物多样性不再是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互分割的自然单元,人类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和伦理道德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不可分,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推进了现代工业文明和经济发展。自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生物多样性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加快消亡的威胁。在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诸多因素中,文化是一个关键因素。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互动共存关系表明,传统文化的消失加快了生物多样性的流失过程,文化多样性不仅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见证,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在探讨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互动共存关系的基础上,针对民族传统文化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当前研究的动态和取得的进展、我国民族文化流失对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影响等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提出了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民族文化保护的若干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保护,民族文化,协同进化,研究进展,加强保护的措施

DOI: 10.3969/j.issn.1000-3045.2011.02.009



裴盛基研究员

自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和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

来,拯救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共识和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行动纲领。然而生物多样性减少与灭绝的速度依然在继续加快,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仍在不断缩小,越来越多的动植物被列入红色名录。据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受威胁动植物物种大幅攀升,受威胁动物已达5800种,受威胁种子植物达4409种,大大高于1998年估计濒危物种数(2%—30%),特别是植物的濒危物种比例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估计数字<sup>[1]</sup>,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地球上1/4的物种将要灭

<sup>\*</sup> 收稿日期 2010年9月24日

绝。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使环境保护中隐含的文化问题不断显现出来,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巨大威胁的真正驱动力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而是选择经济发展方式的文化价值观的力量。

## 1 文化表达人与生物多样性的互动共存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动植物及其生态系统早已融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是形成和发展人类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距今约 2.8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从这一时期开始,人类不再类同于其他动物种群仅以觅食和进行生殖繁衍为其生存目的,文化功能成为人类比生物功能更为强大的力量,人类对其生存环境中的其他动植物种群及其生态环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7 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一本名叫《我们共同的未来》(WCED1987)书中指出:“生物多样性的加速损失不仅意味着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损失,而且破坏了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和特殊的结构。这种文化多样性依赖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持续性而存在,并且与它们协同进行”。1991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提出为实现持续发展的策略——“关怀地球”,并呼吁:地球上每一个物种是所有生物体构成的生命群落的一部分,这些群落将所有人类社会,包括现代和将来的人类联系在一起,将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它既包含了生物多样性,也包含了文化多样性(IUCN, UNEP, WWF, 1991)。

文化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由抽象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组成<sup>[2]</sup>。文化通过语言习惯而非生物遗传。人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自远古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表现出多层次、多

方面和多样性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人们所从事的生产、生活、信仰和习俗具体地表现出来。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认知、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文化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差异很大的。人类文化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所有层面: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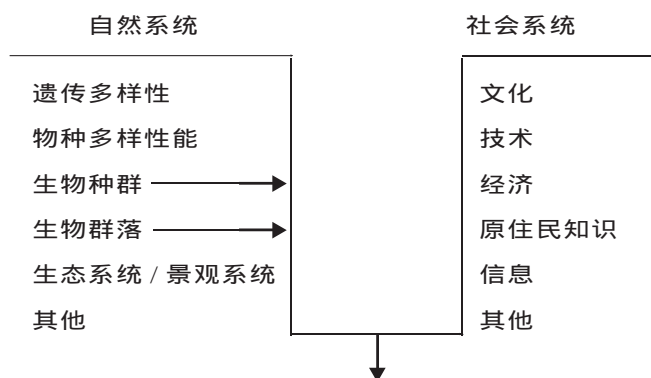
## 2 研究动态与进展

早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从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各个层面实地考察中,通过“跨文化(Cross-cutting Culture)”研究,对一些地区的民族文化与生物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做过一些比较研究。1984 年在《东南亚的文化信仰与人类生态学》一书<sup>[3]</sup>中,应用典型案例分析(Case Study)的方法,围绕人类文化价值观(Cultural Values)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对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文化信仰对植物环境的影响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采用民族植物方法研究分析了傣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和生态学意义。在 1984—1996 年期间,美国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学者,与亚洲生物学家、农学家和生态学家合作,对亚洲热带农业生态系统进行了研究与评价,大大推进了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该项研究理论体系的特征是把民族文化为核心的社会系统和森林与农田的自然系统共同纳入完整的生态系统研究之中,就系统的生产力、稳定性、持续性、均一性和恢复力 5 个指标对东南亚和我国云南热带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进行分析研究,首次提出文化是社会系统中的第一要素的研究理论框架,如下所示:

我国早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特别是民族学中有民族志、田野研究,涉及到大量



中国科学院



引自:Pei Shengji and Percy Sajise (1995): Regional Study on Biodiversity: Concepts, Frameworks and Methods.云南大学出版社

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研究比较多的有傣族的“垄山(神山林)”、彝族的植物崇拜、藏族的“圣山”,云南、贵州山地少数民族的护寨林、水源林及珠江三角洲的风水林等<sup>[4]</sup>。

(2)传统知识体系与生物多样性管理。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是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和

动植物在农耕、采集、狩猎、游牧以及民俗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较少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采用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的方法,研究民族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1985—2009年间,以民族植物学家、林学家、生态学家、民族学家和自然保护区工作者为主体的一大批学者,相继开展了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百篇研究论文,研究内容的重点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1)文化价值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包括原住民对生物的认知、利用和保护的价值观、伦理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植物崇拜、神山、神林、护寨林和汉族的水源林、风水林等自然圣境(Sacred Nature Site)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形式的民族传统文化信仰,无论是“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和宗教崇拜,在历史上都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的作用,这些文化信仰的核心包含着人与自然共生、生物伦理道德和民族文化标记的多重内涵,是先辈认知和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凝聚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一种无形力量,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对于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

技巧,由人们世代实践和表达所保存与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具有穿越历史时空、自然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特征。传统知识是认知、解读和表意的精密复合体,是文化综合体的重要组成成分,广泛存在于语言、名称、分类系统、资源利用实践、仪式、精神信念以及世界观之中。“传统的和当地知识系统作为认知和了解世界的动态表达,在历史上已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必须保存、保护、研究和促进这一文化遗产和经验知识”<sup>[5]</sup>。传统知识包括文传知识和口传知识,最近20多年来,我国民族植物学工作者围绕原住民传统知识的研究,特别是对正在面临消失的民族民间口传知识的调查、记载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围绕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口传民间传统知识有关植物物种的认知、利用、保护和为建立以资源管理为核心的民族传统知识数据库(Traditional Knowledge Data-Base)提供基础信息和可靠数据,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管理提供重要科学支持。中央民族大学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建立起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数据库,主要包括5方面的内容:①传统生物遗传资源;②传统药用动植物及药方;③生物资源利用传统技术;④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习俗和

习惯用法;⑤传统地理特征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知识调查研究已经涵盖到 45 个以上民族,涉及到野生植物中的药用植物、食用植物、非木材林产品、染料植物、纤维植物、个体护理用植物、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以及文化用植物等几乎各种用途的植物种类<sup>[4,6]</sup>。

(3)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适应性技术。我国幅员辽阔,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民族发展和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生物多样性资源的适应性技术,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生活在森林地区的民族,对森林持续利用主要通过非木材林产品的利用完成。我国西南横断山区的民族对药用植物和野生食用菌(松茸、羊肚菌、木耳等)的采集利用和云南热带地区民族对森林野生蔬菜和食用植物的采集利用都有很多的研究例证<sup>[4]</sup>。湖南、贵州、广西等地侗族、苗族、瑶族在土壤贫乏的喀斯特地区培育杉木人工林的传统技术,历史悠久,林木生产稳定持续,是十分独特的人工营林适应性技术。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和干旱荒漠地区,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当地民族积累发展了丰富的传统资源管理方法和技术,维护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干旱荒漠生态系统的保护方法。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地区蒙古族对草原饲用植物利用种类高达 513 种,占当地野生维管束植物种类的 79%,其中优等饲用植物 51 种,良等饲用植物 106 种,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放牧、刈草和贮存饲草的技术方法;同时被利用的草原食用植物达 77 种,包括粮、茶、果、菜用等不同用途和采收、利用、加工、贮藏的技术<sup>[7]</sup>。在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技术中,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薪炭林铁刀木(*Cassia siamea*)种植技术是较为独特的民族传统技术。民族植物学研究表明,傣族人工种植铁刀木的传统实践是保护热带森林和对湿热地区生态环境适应的

传统技术对策<sup>[4]</sup>。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定点调查研究中,发现农户庭园植物的引种栽培管理是户级水平上对生物多样性的有效管理与保护,对云南高黎贡山、西双版纳,内蒙古和新疆吐鲁番不同民族地区的研究表明,传统庭园植物栽培具有物种多样性、群落结构合理性和功能多重性等方面的特点,是我国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的又一重要途径<sup>[4,8]</sup>。

(4)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截至 2009 年我国已经有“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等 29 个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地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有“哈尼梯田农业系统”等 4 个地区被选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系统(GIAHS)”。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地不仅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同时具有极高的民族文化和景观文化保护价值。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联合国推动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相结合的典型,体现出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传统社会的高度结合,具有传统文化整体保护的功能,在动态发展中进行开放式保护,强调“适应性管理”即文化、经济、生态的适应性,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能充分体现出对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各种农业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保护<sup>[9]</sup>。我国有悠久的农业文明且一直延续至今,世代相传的农业文明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战略意义。

### 3 文化消失加快生物多样性流失

在全球经济化发展的巨大冲击下,我国经济发展由传统农业文明发展模式转变为工业文明发展模式,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传统有机农业已转变为高产高效、品种单一的石油农业和转基因高科技农业,这是中国



中国科学院



近万年农业史上首次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载体。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必然导致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同样也会加快生物多样性的流失。人类学家指出:我国“文化物种”的消失比生物物种的流失要快得多,许多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年长者说:社会的变化太快,昨天的生活今天已经成为“文物”,要加以保护才能存在。这些生动的比喻揭示了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规模空前的文化消失的普遍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前,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在我国消失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1)传统知识流失严重。首先是传统农业品种的知识伴随传统品种的遗弃而丧失殆尽,据原中科院云南热带植物所调查,在上世纪70年代,西双版纳水稻传统品种有800个,旱稻品种400多个几乎都不再种植,相关的知识已经丧失<sup>[10]</sup>。第二是传统医药知识,随着现代医药的发展和农村传统医生的老龄化、弱势化和边缘化,拥有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人越来越少,西双版纳傣族村寨共有660多处,在上世纪70年代几乎每一村寨都有1—2名民间医生,现在全部傣医人数只有60多名;第三是传统生态学知识已经伴随生态系统的改变而逐渐消失。

(2)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在我国很多民族地区,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最为明显,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中有关动植物森林保护等传统知识正在消失,年轻一代不再参与村社的相关传统文化活动,大量人口进城务工,失去了与自然界紧密联系的生存环境。过去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是种植铁刀木为薪柴,每人种30—40株树,留传后代,如今改为种橡

胶树留给后代。

(3)现代发展方式加快了传统生产技能的流失。作为文化载体的传统生产技能正在从农村各个生产领域消失。农业、林业、畜牧业、手工艺、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传承了几千年的生产技能正在被机械化、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所取代。云南河口县瑶山乡是一个有10500人口的蓝靛瑶地区,这里地处热带山地,世代依靠刀耕火种种植旱稻、棉花和染布原料植物板蓝根(*Baphibicanthus cusia*),每年每人要自制蓝靛染制的土布衣服2套,自上世纪以来,这里全部土地种上了香蕉和菠萝,不但失去了传统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而且失去了种稻、种棉、纺织棉布用植物染布的全部生产技能。

(4)传统文化传承机制的解体。传统文化的传承依靠特定的社会组织和形式代代相传,在许多地区随着传统俗成的各种组织和传承人的消失,传统文化也失去了传递的渠道和形式,无法继续传承而逐渐消失。

(5)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相互联系的缺失。在我国现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指南和管理体系中,较少关注文化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相互联系,往往把文化多样性置于保护之外。在一些自然保护区开展的社区共管保护活动中,十分重视社区群众参与保护的行动,而由于认识上的缺失,尚未将传统文化的无形力量纳入保护的行动中。

(6)对传统文化认识尚有某些误区。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对应的,文化历时间而变迁,没有不变的文化。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认识上存在某些误区是不可避免的。先进的文化是在淘汰和拼弃不适应时代的文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对传统文化中非科学的消极和低俗成分,应加以甄别、限制和扬弃。

#### 4 重视民族文化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些建议

在两个国际《公约》的指导下,依照我国的国情和政府制定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规则,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好的赞誉和认同。在当前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加快流失的严峻形势下,我们仍需继续努力,不断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必须进一步重视和发挥民族文化在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现提出一些建议供进一步探讨:

(1)在《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两个国际公约和我国相关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的指导下,依照我国国情和现阶段发展的实际,制订相关法规,引导和动员社会力量,挖掘和利用文化的力量,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活动,进一步提高相关部门的职能和公众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了解与认识。

(2)加强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相关理论、方法和途径的研究能力,加强对各民族传统知识的调查、记载、编目和传统知识数据图书馆(TKDL)的建立,把“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研究”纳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范围内,给予特别支持,以促进我国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和跨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

(3)加大政府、企业和民间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支持力度,在社会公众中广泛传播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低碳、低能耗和有机循环经济生产的传统知识、生产技术和技能,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发展的实践中,为创造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做出贡

献。

(4)完善组织与协调机制,把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落实到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间,形成分工合作,统一协调的完善机制。

(5)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和国际间交流,促进相互了解与合作。在区域性的合作组织中建立“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组,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成效,实现互利共赢。

#### 主要参考文献

- 1 汪松,解炎主编.中国物种红色名录,BWG/CCICFD.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 2 哈维兰著.瞿铁鹏,张译.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3 Karl L. Hutterer, A. Terry Ramboo, Garge Lovelace. Cultural value and human ecology in southeast asia. Michigan Paper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Number 27, Ann Arbor Michigan, USA, 1984.
- 4 裴盛基,淮虎银.民族植物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 5 ICSU. ICSU Series on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 4. Scienc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2.
- 6 薛达元,郭冻.中国民族地区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保护与惠益分享.资源科学,2009,31(6):919-924.
- 7 哈斯巴根.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蒙古民族植物学研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2000.
- 8 裴盛基,龙春林.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
- 9 闵庆文主编.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前沿话题.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 10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热带植物研究论文报告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中国科学院

##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ei Shengji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AS 650204 Kunming)

**Abstract** Under the tremendous impact of human society on various life forms, biodiversity is no longer a single and separated natural unit from human society. Cultural value view, socio-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y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ethics and moralit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oday,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s not only an issue of scienc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greatly pro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conom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s been speeded up, and biodiversity has been faced with the massive pressures and the threat of accelerated speed of the extinction of it. Among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culture is a key factor. The interaction and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shows that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speeded up the losing process of biodiversity, and culture diversity does not only provid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itn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ut also possesses important realistic valu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today. On the basis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interaction and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s of China to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the status of the current studies and progress made so far in this field, as well as the negative serious impact of the disappearing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on biodiversity, and furthermore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enhancing of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in relation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Keyword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national culture, coexistence evolution, research progress, to strengthen protection measures

裴盛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38 年出生。资源植物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民族植物学会主席,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 林奈学会高级会员。历任中科院原云南热带植物所所长, 昆明植物所副所长, 国际山地综合开发研究中心资源环境部主任, 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技术顾问, 国际民族生物学会主席。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开创者。E-mail: Peishengji@mail.kib.ac.cn